

以政變俗：國家權力與 上海春節習俗變革

• 趙鳳欣

摘要：本文基於對近代上海春節習俗變革的研究，試圖探討現代化背景下國家權力與習俗變革之間的關係。本文的研究顯示，在一個邁向現代化的社會中，國家為塑造政治權威，必然要借助習俗變革的方式控制民眾，動員民眾。從民國時期到共和國時期，這一政治技術的運用愈趨成熟，以致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對春節習俗的革命化重構。直至1980年代全能國家時代結束，政府對春節習俗的變革由政治導向轉向民俗導向，春節習俗才得以回復。本文認為，現代國家從習俗變革中構建政權合法性，加強對民間習俗的干預，其出發點無可厚非，但其過程應避免簡單化、粗暴化。只有得到民眾的理解與支持，政府才能達致推動習俗變革、強化政治權威的目的。

關鍵詞：國家權力 春節習俗 習俗變革 上海 政權合法性

民俗伴隨着人類社會的產生而產生。中國地域廣闊，民族眾多，民俗豐富、形式多樣。但有學者研究發現，中國各地的民俗卻是在中華民國作為現代國民國家（民族國家、多民族國家）興起和成長過程中被發現和定義的^①。這反映出現代國家的創建與民俗發現之間的微妙關係。在現代國家建設中，為構建政治認同、實現社會文明進步，就需借助對傳統的批判來推動社會變革，獲取民眾支持，而隱藏在民眾中間的傳統習俗，就成為現代國家關注的對象。可是，在試圖通過變俗達到變政的目標之下，現代國家所力求的現代化，卻遭受到了來自民間習俗的挑戰。面對這一挑戰，現代國家以政權的力量積極介入民俗變革，或干預或整合，由此也引發政府與民眾的不斷較量。

* 本文是上海市教委科研創新重點項目「近代以來上海春節文化的嬗變與傳承」（12ZS089）的階段性成果

近年來，民俗學和人類學的研究已經注意到了國家力量在民俗行為變遷中的影響。如萬建中認為，對民俗的干預和介入是相關權力機構的權力，對於傳統所構築的活動空間，政府也會加以控制和利用^②。但更多的學者是通過對某一領域或某一時期民俗變革的研究透視民間儀式中國家力量的在場，如左玉河對民國時期提倡過陽曆新年所引發的政府與民眾衝突進行的研究，以及李軍全等人對中國共產黨在華北根據地利用春節文娛進行政治宣傳與動員的研究^③。儘管這些研究成果認識到了政府（或政黨）在春節習俗變革中承擔的角色與作為，但對特定時期、特定領域的片斷化研究，難以展現近代以來國家權力主導習俗變革的整體畫卷，也就難以反映出不同時期、不同政權之下習俗變革的內在聯繫。尤其是對文革的研究，一般認為文革是借助各種政治運動得以開展，但卻很少注意到政治運動的背後仍不乏國家對民俗的運用，其時對「革命化春節」的提倡就是一個例證。

從地域上來講，上海在近代史上具有一般城市所不具備的特性，正如熊月之指出：「在古今中外城市史上，沒有一個城市像近代上海那麼內涵豐富，情況複雜」，近代上海「人口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必然帶來節假日多元、風俗多元」^④，可以說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在都市上海得到了較好的體現。上海本身的「多元」，使得上海民俗的變異性極為明顯，值得深入探討。可是，民俗本身的變，變的是外在形式，不變的是內涵，這與政府提倡的根本性變革既有一致性，但仍不乏矛盾以致產生衝突。再次，上海人階層劃分明顯，既有精英階層，又有下層民眾，不同階層對政府主導的民俗變革的反應又不盡相同，習俗變革的複雜性也由此可見。同時，無論是民國時期「特別市」還是今天「直轄市」的地位，都使得上海的政策實施最容易反映出國家的意圖。因此，上海民俗變革可以視為政府以政變俗的一個研究案例。基於上述認識，本文運用相關檔案、報刊、訪談等資料，研究民國至新時期以來近代上海春節習俗的變革，以此展示國家權力對習俗變革的主導作用。

一 民國時期的廢曆改元與春節習俗變革

對於民國時期的春節習俗變革，有學者注意到了廢除舊曆運動提倡過陽曆新年所帶來的官民衝突，並分析了衝突背後的文化內涵^⑤。那麼，是甚麼導致了這種文化衝突？一個直接原因就在於國家權力及其所代表的國家文化向地方的延伸。正如美國歷史學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指出：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鄉村經歷的一個巨大歷史進程就是國家企圖加深並加強對鄉村社會的控制^⑥。其實，不僅是在鄉村，國家同樣把對城市的控制作為鞏固國家權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民國時期政權雖有更迭，但歷屆政府無不把變革習俗的理念付諸實踐，以期通過習俗變革構建政治權威。

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宣告成立，但新生政權「依靠革命建立的法理性權威不具有先賦性」^⑦，亟需依靠各種儀式予以強化。南京臨時政府在

其存在的短短幾個月內就頒布一系列包括改用陽曆在內的變俗措施，廣泛開展移風易俗。滬軍都督府為配合南京臨時政府的改革措施，立足上海地方，自1911年11月至1912年3月發布了十五條關於風俗改革的政令^⑧，涉及易幟改元、禁煙禁賭、改變稱呼、改革禮儀等方面。1912年1月15日，滬軍都督府補祝陽曆新年。是日，上海各公署、商鋪均懸民國燈旗以示慶賀，英法公廨也停訊一天；晚上社會各界提燈遊行，「街市頗極一時之盛」^⑨。滬軍都督府主導的這次慶典，彰顯出政府改元新氣象及改用陽曆之決心。但因南京臨時政府存在時間短暫，其措施也大多未能實施。

北洋政府作為南京臨時政府的繼任者，繼續強化「改正朔」的措施，認為「現在共和政體業經成立，自應改用陽曆，以示大同」^⑩。1913年陽曆新年是南北統一後的第一個新年，北京總統府、國務院及外省都督府、民政府等各部門，「相與懸旗結彩，脫帽鞠躬，歡呼『民國萬歲』者，何等興高采烈」^⑪。不可否認，政府的習俗變革得到了受過現代教育的政界、軍界等人物的支持，如當時《申報》報導混成第三旅要求舊曆新年「斷不至再有相沿舊俗賀年、歇年、度年之習」，而酗酒、賭博等則由各團長、營長「嚴切告誡，曉以利害，證以得失，一律禁絕」^⑫。但是，面對新年習俗的變革，普通民眾卻不肯做出讓步。時人寫道：滬上舊曆新年，路上「車馬水龍，洵為一時之盛」，而陽曆新年則「冷寂無聲」^⑬。政府提倡的陽曆新年並未得到民眾的響應，民眾仍在歡度舊曆新年。

那麼，是甚麼導致民眾對慶祝陽曆新年的抵抗呢？眾所周知，民俗承擔着一個民族的心理情感和精神依託，是民眾內心世界的反映。慶祝陽曆新年實際是對民眾習慣的推翻，自然難以為民眾所接受。面對政府與民眾過兩個新年的社會現象，政府也在試圖調適這種衝突。1914年1月，內務部在遞交袁世凱的呈文中認為，「乘時布令，當循世界之大同，而通俗宜民，應從社會之習慣」，「擬請定陰曆元旦為春節……凡我國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員，亦准給假一日」^⑭。此建議得到袁世凱的批准。這份呈文在把舊曆新年改稱「春節」的同時，實際上賦予民眾過舊曆新年的合法性，在北洋政府時期成為定例。

但是，這種調適的政策卻為後來的南京國民政府所反對。南京國民政府認為，陰陽曆並用「是軍閥假共和名行專制實的一種象徵」^⑮，理應徹底變革。因此，南京國民政府採取激進措施，從人民的物質、精神、社會生活等方面全面進行春節習俗變革。就其措施，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其一，廢除舊曆新年，厲行陽曆新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伊始，就將陽曆定為國曆，並規定「嗣後無論公私事項，一律遵用陽曆」^⑯；對於以舊曆為載體的節日習俗，則按陽曆日期舉行。1930年6月，國民政府通過〈推行國曆辦法〉，規定「廢曆新年前後所沿用之各種禮儀娛樂點綴，如賀年、團拜、祀祖、春宴、觀燈、扎采、貼春聯等一律移置於國曆新年前後舉行」，「廢曆新年不許放假，亦不得假藉其他名義放假」^⑰。隨後，上海市亦制訂相應的〈推行國曆新年辦法〉，規定「祭祖、年飯、春宴均改於國曆年終年首舉行之」^⑱，至舊曆新年，「各界一律不得休業」^⑲。國民政府之種種措施，正在於試圖將

春節民俗活動融入到陽曆體系之中，促使民眾習慣於使用陽曆，達到廢除舊曆的目的。

其二，查禁春節舊俗、陋習。對於上海市民而言，舊曆新年生活「最重吃和賭，其實賭比吃還要利害」^②。春節期間存在的舊俗、陋習也就成了政府試圖取消舊曆新年的理由。在破除迷信、革除惡習的名義下，1930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發布公告，認為「燃放花炮，售賣春聯，及施放手擲金錢炮，暨藉口消遣、任意賭博等情事」，「凡此惡習迷信，均宜極力革除」，「以符政令而維治安」^③。1931年公安局再次發布公告，認為對於陋習「自應一律革除，至於燃放爆竹敲鑼擊鼓休業賭博等事，尤應嚴禁」^④。為此，上海市政府甚至動用警察查禁舊俗，禁止人們過舊曆新年。如1931年上海的一名江北苦力，舊曆新年大年初一在家門口放鞭炮，被警察看見說他違章，他到警局解釋「說是替他父親做生日，故而放鞭炮，並不是過新年」，結果罰他大洋3元了事^⑤。上海市公安局對於舊習的查禁，在除舊布新的外觀下，更有配合政府推行陽曆新年的目的。

面對政府的強力變革，民眾是如何與日益增強的國家力量對民俗生活的干預進行抗爭的呢？雖然政府三令五申廢除舊曆，但是上海舊曆新年「仍然是『爆竹除舊』，『桃符換新』，無論是『特區』或是『中國地界』的商店，都一律閉戶休業」^⑥。新年燒香的人群，在紅廟裏，「洋傘柄折斷了，身體還沒有擠出來」；城隍廟大殿上燒剩的蠟燭頭，「可以堆一坐小山」，鞭炮更是「劈劈拍拍，鬧到天亮」^⑦。普通民眾對舊曆新年的認同，無形中挑戰着國民政府的權威。面對舊曆新年在民眾中間深厚的影響力以及因廢除舊曆帶來的社會動盪，1934年初，國民政府當局不得不認為：「對於舊曆年關，除公務機關，民間習俗不宜過於干涉。」^⑧這反映政府最終無力徹底改變民眾的習俗。

民國時期上海的春節習俗變革，在改革陋習、促進社會進步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於春節習俗廣泛根植於民間，政府變革春節習俗困難重重。即便是南京國民政府採取強制手段，通過變俗構建政府權威和推動社會迅速向現代轉型的目的也遠未達到。政府慶祝陽曆新年、民眾慶祝舊曆新年，兩個新年的存在仍是社會常態。

二 建國初期的「新年畫運動」與春節娛樂習俗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對於新國家的建設，毛澤東曾發出豪言壯語：「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⑨在新的政權組織之下，政府通過對宗族、宗教等傳統社會組織的徹底打破與改造，把國家的權力滲透到地方，並把「人們按照階級和利益重新組織起來，使人們牢固地歸屬於行政組織」^⑩，從而建立起了國家對民眾的直接控制。在加強這種有效控制的同時，中共領導下的政權通過意識形態對傳統社會的習俗觀念加以破除，引導民眾接受新的價值體系。縱觀建國初期的春節習俗可以發現，與新社會不相符的舊習俗逐漸被批判，體現政治特徵的新習俗得以提倡。

(一) 宣傳說教與「新年畫運動」

年畫作為民間文化的一種載體，無論是表達「多子多福」還是「敬神保平安」的意象，都被視為一種落後、封建迷信的思想而難以與「國家」這個概念掛鉤。但是，新政權卻注意到了年畫所蘊含的宣傳說教功能，認為對之加以改革就可成為政策宣傳的有效工具。對於1949年以來的「新年畫運動」，無論是從民俗學、美學還是歷史學的角度，已有的研究成果描繪出了年畫這一傳統民俗藝術形式發生的變革^⑳。以下我們仍將借助1950年代最突出的這項變革來闡釋國家權力在民俗變革中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早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開始通過創作新年畫來動員民眾，宣傳抗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政府繼承了延安時期的新年畫運動。1949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發布了〈關於開展新年畫工作的指示〉，指出：「今年的新年畫應當宣傳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傳共同綱領，宣傳把革命進行到底，宣傳工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在某些流行『門神』畫、月份牌畫等類新年藝術形式的地方，也應當注意利用和改造這些形式」^㉑。這份指示明確了新年畫宣傳的內容，指出了新年畫應當涉及的範圍，實際也是宣告了國家對年畫創作的領導權。在政府的主導下和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下，新年畫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反映國家新形象的年畫不斷誕生。但1951年10月18日由文化部、出版總署發布的〈關於加強年畫工作的指示〉卻指出：兩年以來，新年畫「作品的產量尚不及舊年畫多」，因此要求各地文教主管部門「加強年畫創作的領導與計劃性」^㉒。

那麼，新年畫發行面臨的困境是甚麼呢？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新年畫運動是政府推行的帶有意識形態的運動，它不僅僅是在教育農民（民眾），更是在改變他們的風俗和習慣^㉓。對於政治主題的過份關注，就使得年畫偏離民眾的日常生活。如1951年上海彩畫第一聯營社選印的年畫《加強抗美援朝宣傳》、《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等，實際是政治任務的再現，無論如何也難以符合民眾的口味。在上海這座大都市，人們對美的追求也使得畫有摩登女郎的年畫難以退出市場，即便是所着重表現的勞動婦女，「實在只是美女圖的翻版，和美女圖所不同的只是在美女身上穿上了列寧裝、工人、農民服裝而已」^㉔。然而，建設一個整體化社會的目標卻預示着政府不可能對年畫採取放任的政策。我們從1958年遭到批判的《晚會新裝圖》就可以看出國家權力是如何利用宣傳機器來佔領年畫發行陣地的。

《晚會新裝圖》是上海著名月份牌畫家金梅生1957年的作品。在這幅作品中，身穿旗袍的女性形象優美，作品出版後，也廣受民眾歡迎。如1958年河北省就訂貨20,495張，與《毛主席在農村》（訂貨80張）等政治年畫相比，訂貨量遙遙領先^㉕。為了迎合當時的政治主題，畫家在畫的下面還特意添加了幾行字：「晚會上，試新裝，新裝美觀又大方，薄羅輕紗披兩肩，紅裙素裏增風光；借問姑娘底事笑，姓名新登光榮榜。」^㉖這幾行字的用意就在於把姑娘的笑與「新登光榮榜」聯繫起來，實際上也是試圖把畫中的美與政治宣傳掛鉤，

這也表明在國家權力面前畫家的複雜心態。即便如此，政府仍然認為該作品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反映現實生活不夠。當時在美術界發揮輿論導向作用的《美術》雜誌更在1958年發表一系列文章，借助群眾之口對該作品展開批判，如工人說：「八級工也養不起她」，農民表示「不愛看她」³⁶。政府控制下的報紙，如《文匯報》也撰文批判它「透露出一種不健康的情感」³⁷。在輿論的配合下，政府強制《晚會新裝圖》停止銷售，剩餘庫存逐漸向國外發行³⁸。

正是上海傳統年畫迎合了群眾的生活追求，反映着中國傳統社會生活的特點，建國後新年畫運動開展之際，「上海私營出版業所印行的舊內容年畫及月份牌畫片，仍在全國各地大量銷行」³⁹。發行量雖然暗示了民眾的認可，但卻難以取得國家的認同，國家也從未放棄對以月份牌為代表的傳統年畫「政治正確」的領導與改造工作。在國家的管控下，儘管傳統年畫受到民眾歡迎，但實際上這已是日暮西山，背離政治主題的年畫也愈來愈失去生存空間。隨着各項政治運動的開展，政府力量逐漸佔據主導地位，到了文革時期，年畫與領袖畫像已經很難區分。

(二) 政治滲透與娛樂習俗政治化

春節作為一個全民性的節日，娛樂是歡度春節不可缺少的內容。春節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豐富多彩的娛樂方式。上海開埠以來，西方工業文明的娛樂方式也傳入上海。但無論是中國傳統的春節娛樂還是外來的娛樂活動，都難以立即與新政權的話語體系掛鉤。因此，中共政權在通過新年畫向民眾直接進行政治宣教的同時，也利用春節期間民眾的文娛活動，潛移默化地將國家的意志滲透到民眾中去。

1949年12月21日，文化部、教育部發出〈關於開展年節、春節群眾宣傳工作和文藝工作的指示〉，認為1950年新年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第一個新年，要充分「利用這個時機開展群眾文藝活動，向人民進行宣傳教育」，宣傳解放軍的偉大勝利，宣傳恢復和發展生產⁴⁰。在此，國家政權充分認識到了借助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春節娛樂宣傳國家政策的重要性。1951年1月14日，文化部、教育部下發〈關於開展春節群眾宣傳工作與文藝工作的指示〉，除了明確「春節宣傳的內容應着重從各方面來反映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高潮」，「充分發動廣大戲曲界藝人及戲曲團體參加春節表演」，同時還提出了配合戲曲改革的任務，認為「各大城市中可舉行新戲曲節目競賽公演，藉以擴大宣傳並推進戲曲改革工作」⁴¹。為貫徹文化部、教育部利用春節對群眾宣傳的指示，1951年春節期間，從正月年初一到年初四，上海文藝界以話劇、歌舞劇、音樂演奏等形式，在大世界、大新、先施等三大遊樂場進行了演出，「內容都是關於抗美援朝新愛國主義教育，慰勞解放軍和冬防防特的」。在政府組織的這次演出中，文藝節目以宣傳武器的姿態出現，但這些政治化的文藝節目也不失娛樂性，民眾也樂意觀看，「到處逢人打聽哪裏在演解放戲〔群眾語，指1949年以來政府主導下的新戲曲〕」⁴²。

對於戲曲改革，隨着中共政權在上海的建立就已着手開展。1950年春節期間上海進行了戲曲演唱競賽，這次演唱競賽是伴隨着對舊藝人、舊戲曲的

改造而進行的，據1949年12月《文匯報》的報導，它「不但是在新年裏演新戲，並且要因此而迎接明年度〔1950年〕的戲曲曲藝改造高潮」^{④③}。對此，報紙在宣傳中稱之為上海戲曲界「演唱競賽的大運動」，因為在這次競賽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劇場劇團都參加了這個大競賽」，並且「一百多個大大小小的戲館近萬個戲曲工作者都將帶着他們的新戲曲走進這個運動」^{④④}。對於1950年春節期間的這次演唱競賽，〈上海市地方戲曲、曲藝改造運動春節演唱競賽條例〉明確規定：「評判尺度以編劇、編詞、導演、演唱技術與舞台技術在民族形式、科學內容、大眾方向的標準上各按其政治水平與藝術水平之高下評分。」^{④⑤} 評判標準清晰地表現出了戲曲改造與現實政治的關聯性，把反映政治水平與藝術水平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來評判戲曲的優劣，這必然促使戲曲在創作過程中更多地向政治現實靠攏，使政府的意志通過戲曲宣傳變成全民的意志。這也是政府進行戲曲改革與演唱競賽的目的所在。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的反映「大吉大利」、「五福臨門」等春節主題的曲藝相繼減少，體現政治主題的新戲曲逐漸佔領文藝陣地。

然而，在娛樂走向政治化的過程中，傳統的娛樂方式作為民間文化，仍受到政府部門的重視。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工會聯合會、青年團上海市委在1957年發布的〈關於開展春節群眾文藝活動的聯合通知〉中要求「應充分運用龍燈、高蹺、獅舞、皮影戲、民歌、民間樂器等傳統的民間文藝形式」，使春節文娛活動廣泛深入開展^{④⑥}。此外，上海市政府把文化館作為「輔導與組織群眾開展文藝活動的核心」^{④⑦}，通過戲曲、歌舞、評彈、快板、相聲等表演藝術形式，滿足民眾春節娛樂需求。1955年春節期間，上海曹楊文化館內各活動室和籃球場均有人滿之患，窗口上也站滿了人，還有人爬在電線杆上或坐在屋頂上看球賽^{④⑧}。可見政府在改造娛樂的同時，也在確保民眾娛樂的多样性，因此政府與民眾在春節娛樂的形式方面沒有產生較大矛盾。

1950年代，國家有意加強對春節習俗的改造，變革民眾的傳統習俗，並充分利用春節娛樂來宣傳國家政策，使國家的號召深入到民眾中間。但在家國同構的過程中，國家對春節習俗的變革基本採取引導的方式，並未強制改變民眾的春節習俗活動。因此，1950年代春節習俗的變革，總體而言是朝着良性的方向發展，春節習俗活動基本按照其固有的理念進行操演，政府與民眾也並未出現較大的衝突。

三 文革期間的「革命化春節」

1960年代，國家進一步加強對社會的管控。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全能國家的特徵愈發明顯，民眾的生活為國家所左右。在「革命」的口號下，春節習俗的變革也難以脫離革命話語的影響，過一個「革命化春節」成為時代特徵^{④⑨}。過革命化春節，正是國家政權以「破舊立新」、「移風易俗」相號召，採取更加激進的措施破除傳統習俗，樹立革命新俗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民眾被置於國家的有效控制之下，服從和服務於國家建設的需要。

(一) 春節舊俗的破除

文革是以「破四舊」為先導的，而在「左」的思想指導下的「破四舊」，本身就包含對傳統的顛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創造和形成嶄新的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⑤。8月8日，中共中央號召「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⑥，但對於甚麼是新的，甚麼是舊的，卻沒有明確說明。由此所造成的一種印象就是，傳統的、歷史的就是舊的，應該加以破除的。那麼，反映到春節習俗上來，傳統的春節習俗自然屬於舊俗，理應打破；尤其是傳統社會中貧窮與富裕人家過年形成的鮮明對比，更是使得春節被貼上「階級」的標籤，當時上海有報章認為剝削階級正是「利用春節大搞封建迷信，求神祭祖，提倡虛偽禮節，請客送禮，酗酒、賭博、大吃大喝，使『春節』成為『四舊』泛濫的市場」。種種「罪惡」使春節習俗成為「幾千年來剝削階級套在勞動人民脖子上的精神枷鎖」^⑦，被列入「破除」的行列。

在破除舊風俗，提倡新風俗的號召下，1967年春節前一天，上海「車站、碼頭，沒有像往年那樣擁擠着等候回鄉的人群，大街上也很少看到像往年那樣捧着大包小包，為着吃喝玩樂而奔波的人們」，番瓜弄八號的武大媽也「革」掉了吃年夜飯的老規矩，認為「既節約，又不費手腳，大家忙著鬧革命，這是第一好呀」^⑧；中國食品公司上海市禽類蛋品公司的員工也在1967年春節「大大改變了往年春節回鄉探親以及串親送禮，你來我往，忙吃『年夜飯』的舊習俗，而是把革命放在第一位，以生產為重」^⑨。對文革期間春節舊俗的破除，一位受訪者給我們做過這樣的描述：「衣服不能穿得太好，過年不能放炮，都要低調，不要高調。」^⑩在革命化春節下，民眾的活動變得「低調」起來，熱熱鬧鬧的氣氛逐漸在退去。

但是，傳統習俗存在於民眾的頭腦之中，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具有抵制變化的完整性和延續性」^⑪，其消退的過程並非政治運動所能完全左右。在國家權力的嚴格管控下，傳統的春節習俗仍在延續，儘管儀式簡化了很多。在實際採訪中，當問及革命化春節期間有沒有偷偷燒香、進行敬神之類的活動時，有受訪者告訴我們：「我奶奶一直做，我奶奶不管文化大革命也好，不是大革命也好，她照做不誤」^⑫；「有的人就偷偷給老祖宗燒點紙」^⑬。在文革這樣一種極端政治氛圍下，仍然有人冒着風險繼續進行「迷信活動」，反映出民眾對神靈的畏懼感，對敬神祭祖儀式的認同感。社會各種舊有習俗活動表面上的消失，與政府強有力的社會控制密不可分，卻難以形成民眾的自覺認同。

對於春節期間的吃和穿，政府在盡力保障供應的同時，也試圖減少民眾的購買意欲，緩解市場壓力。於是，勤儉節約的號召不斷「上綱上線」，被認為是無產階級的優良傳統，從而得到大力提倡。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認為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企圖把一些群眾引向經濟主義的邪路，不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單純追求個人的暫時利益」，從而號召革命群眾「必須立即制止這種破壞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為，立即制止這種大鬧經濟主義的傾向」^{⑤⑨}。同時，毛澤東也進一步號召，「要節約鬧革命」^{⑥⑩}。正是文革以來所造成的經濟混亂、物資短缺，黨和政府才不得不把節約提高到階級鬥爭的角度來認識，號召在春節期間「要提倡以艱苦樸素為榮，以鋪張浪費為恥，用無產階級的節日觀來把關，把生活上的安排也提到階級鬥爭的高度來認識，絕不給『四舊』開方便之門」^{⑥⑪}。但是，國家的這種號召在民眾中間確是難以發揮作用。1968年春節，在上海斜土路菜場，一位婦女聽說春節期間菜要買不到了，即便是冰凍大白菜，不能貯藏，在購買了三棵後仍然在排隊購買^{⑥⑫}。1969年上海有些人在春節期間從市區趕到郊區採購年貨，搶購農產品^{⑥⑬}。1972年春節因尼克松(Richard M. Nixon)訪華，上海有流傳要投放一些熱銷商品和新品種，更有群眾準備好鈔票，不斷在打聽「有些甚麼商品放出來？」、「甚麼時候放？」等^{⑥⑭}。「勤儉節約」的號召，並不能完全改變群眾在春節期間增加消費的習慣，也並不能阻止群眾春節期間的搶購行為。民眾對過春節的物質需求，使得國家號召的執行力大打折扣。

(二) 春節習俗的革命化重構

國家權力在破除傳統舊俗的過程中，也在試圖建立一個新的民俗體系，但這個新建立的民俗體系，應該是符合國家意識形態的，為國家所推行的文化一體化服務的。由此，在過革命化春節期間，國家利用政治話語塑造出許多新的春節活動，並依靠國家的宣傳網絡傳播給民眾。這些春節活動就其本質而言，還在於政府對民眾春節閒暇的控制與促使意識形態的下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其一，春節閒暇與生產的結合。文革作為一場充滿革命理想的政治運動，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之下，卻對生產造成干擾。在政府對生產的關注下，民眾過春節所表現出來的閒暇終歸在挑戰着政府的任務目標。國家正是通過「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將春節期間的休閒娛樂納入到國家的建設之中。透過當時的「革命」口號，如「不停爐，不停產，煉鋼爐前過春節」^{⑥⑮}，「春節加油幹，班班都超產」^{⑥⑯}等，國家已經在有意地引導民眾將春節的閒暇與生產相聯繫，動員民眾投入到國家建設中去。

出於對春節閒暇的控制，1967年1月29日，國務院發出了〈關於一九六七年春節不放假的通知〉，以便「奪取革命、生產的雙勝利」^{⑥⑰}。這年大年初一，上海寶山縣羅店公社金星大隊照常出工，興修水利，面對呼呼的北風，冰涼的細雨，社員卻脫去棉衣，大塊大塊地挖泥開溝^{⑥⑱}。春節不放假，畢竟事關重大，國家也不能無視民眾休息的權利。1968年1月15日，國務院〈關於一九六八年春節放假的通知〉雖然恢復了春節三天的假期，但仍然強調「要動員說服廣大職工就地休假，盡量不到外地去探親或旅行。對享有探親假的人員，要妥善安排，不要集中在春節期間」^{⑥⑲}。在整個革命化春節期間，春節假期是極不正常的，即便國務院恢復了春節假期，但仍有不少單位在加班加點，甚至比往常更加拼命。如1974年春節第一天，上海上鋼一廠的許多工人非但不休息，反而比往常起身更早，有的提前兩個多小時，冒雨從市區趕到廠裏^{⑥⑳}。

在國家對民眾的動員之下，民眾面對來自國家的無形壓力，已經不自覺地融入到這套話語體系中，在「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下，將春節的閒暇予以充分利用，投入到火熱的生產中去。當民眾將春節閒暇投入到生產中去時，這對春節期間的傳統娛樂也是致命的一擊。如上海馬橋手獅舞，獅子彩扎工藝講究，據傳有的甚至要幾個手藝人耗時半個月至一個月才能完成^①，在「促生產」的目標下，時間為國家所掌控，民眾自然沒有充裕的時間進行彩扎。春節期間的大量娛樂活動是以春節的閒暇為基礎條件的，當提倡春節不休息、促生產的時候，傳統的春節娛樂習俗已經失去其存在的土壤。

其二，新型春節儀式的提倡。國家在控制民眾春節閒暇的同時，也在試圖利用春節這個為中國廣大民眾所重視的節日，創造新的儀式活動，宣傳國家的政治主張，以此塑造符合國家意志的新型公民。為此，在過一個革命化春節的號召下，國家動員民眾在春節期間開展家庭鬥私批修會，進行憶苦思甜，大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等。這些日常政治運動與春節的結合，正是國家控制民眾春節活動，推行文化統治的一種方式。

在國家對民眾的嚴格控制下，雖然傳統的敬神祭祖活動在國家權力尚未到達的隱蔽處仍得以進行，但是國家也注意到了家庭的私密性保護對於國家權力的延伸所起到的阻礙，因而家庭鬥私批修會便應運而生。1967年，毛澤東在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時明確提出「要鬥私，批修」^②。在「鬥私，批修」的號召下，春節期間開展家庭鬥私批修會就成為國家提倡的新型春節儀式活動。其典型的場面是全家圍坐在一起，對照領袖言論，對家庭成員頭腦中的私有觀念展開批評^③。家庭鬥私批修會，就其意義而言，是國家借助鬥私批修這一形式，號召民眾打破頭腦中狹隘的個人觀念、家庭觀念，將個人的視野超越家庭，面向整個國家社會，由此塑造具有國家意識的公民。

如果說通過學習毛澤東思想，開展家庭鬥私批修會就是為了塑造社會中的個體，那麼憶苦思甜則是對社會個體的政治教育。黃宗智認為，文革這場運動「既帶來了個人政治生活對私人生活的侵犯，又導致了政治創造的現實對人們精心保留在內心深處的侵犯」^④。憶苦思甜通過回憶、對比、控訴，在「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的呼喊中對參與者的心靈進行一次「洗禮」，引導人們在將其經歷的苦難提升為「階級苦」的同時，實際上奠定了階級關係在社會秩序中的主導性作用。如1969年春節期間，上海砂輪廠老工人韋明華對同班的青年工人和藝徒進行憶苦思甜教育，要求青年「千萬不能忘了老一輩的苦」^⑤。當然，在現實中也不乏流於形式的情況，例如有受訪者回憶：「人家給我們吃憶苦飯，我吃都沒吃。」^⑥但這不能否認國家試圖塑造新型公民的意圖。

對於革命化春節，其內容是現實政治和社會運動的反映。國家政權按照「破」與「立」的邏輯關係來變革傳統習俗，在不分良莠地把眾多春節習俗予以破除的同時，按照意識形態樹立起了充滿政治色彩的「憶苦思甜」等「新俗」。在那個特定的年代，通過廣泛宣傳，大造聲勢，以休閒娛樂為特徵的春節被賦予了濃厚的政治色彩。然而，對春節習俗破舊立新，一方面難以體現春節的豐富內涵，另一方面也難以符合民眾的社會心理和情感需求。

四 新時期春節文化的民俗導向

隨着文革的結束，政治的解凍，國家權力逐漸從民俗領域退卻，全國「一盤棋」的局面被打破，國家與民眾的關係也相對鬆弛。在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下，宗教場所重新開放，民俗活動得以恢復；在劈劈拍拍的鞭炮聲中，春節過得紅紅火火。面對日益繁榮的春節文化，政府在春節文化中的定位，一改政治年代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而是以民俗自身發展為導向，整合社會資源，豐富春節文化內涵，實現政府與民眾的良好互動。

(一) 維護社會秩序

春節是一個全民性的節日，娛樂活動多，人口流動大，同時也是交通擁擠、犯罪率上升、火災多發的時刻。政府作為社會的管理者，能否有效地提前預防、及時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維護春節期間的社會秩序，成為新時期涉及政府權威構建的問題。

上海這座城市以其較多的就業崗位和優質的教育資源，吸引着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和莘莘學子。春節作為一個合家團圓的節日，是回鄉潮的高峰。面對春節期間的交通壓力，政府無論是從購票的簡捷安排還是合理調整班次，都旨在緩解春運緊張的局面，讓在外人員回家過個安定年。對於上海春節期間的寺廟燒香，政府在允許其合理存在的同時，武警部門也是嚴陣以待，維持秩序，保障安全^⑦。相比文革時期政府對春節習俗的強制干預，政府在全能國家時代結束以後更多地是以服務者的姿態出現。

此外，春節期間最為棘手的莫過於對燃放煙花爆竹問題的處理。燃放爆竹象徵着喜慶，更代表着辭舊迎新。對於這項傳統習俗，無論是從保障公眾生命安全、減少火災隱患，還是從保護城市環境的角度來看，都理應加強管理。但是經歷革命化時代對民俗的干預所引起的民眾不滿，政府更願意採取比較緩和的措施。根據1995年開始實施的《上海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上海市政府對禁放區域進行了限定，除限定區域外，允許民眾燃放煙花爆竹^⑧。與此同時，政府也引導民眾圍繞燃放煙花爆竹問題展開討論，讓民眾認識到燃放煙花爆竹存在的危害，從而自覺少放或不放。根據上海市統計局發布的〈2014年上海市民燃放煙花爆竹意願調查報告〉顯示，85.6%的受訪市民表示春節不購買煙花爆竹，81.1%市民贊成全年禁止燃放煙花爆竹^⑨。正是基於霧霾天氣的出現與民眾自身安全意識的提高，民眾逐漸認識到了燃放煙花爆竹的危害所在，從而願意少放或不放煙花爆竹，政府與民眾的認識逐漸趨向一致。

(二) 提倡文明新風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家在重視物質文明建設的過程中，同時把精神文明建設作為重點內容之一。1982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在上海總工會舉辦的春節聯歡會上，號召「全市人民在新的一年裏，要加強團結，振奮精神，積極進取，既要搞好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又要搞好社會

主義精神文明建設」^⑩。市委宣傳部同時要求新年期間集中進行一次「四提倡四反對」（提倡節儉，反對大辦婚事；提倡男女平等、敬養老人，反對歧視虐待婦女、老人；提倡相信科學，反對封建迷信；提倡健康的文化娛樂，反對賭博）的宣傳教育，促進移風易俗，改造社會風氣^⑪。可見政府已經充分把精神文明建設與歡度春節聯繫起來，號召市民在精神面貌上「換新顏」。1985年春節期間上海市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委員會發出的〈上海市一九八五年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要點〉，除了繼續把抓好思想建設、建設文明城市、開展軍民共建和各種形式的共建活動，加強文化建設作為開展「五講四美三熱愛」（五講：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四美：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三熱愛：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要點外，還提出了治理髒、亂、差的工作要求^⑫。在這裏，精神文明建設不僅僅在於人的精神面貌，還包括了社會道德的提倡、城市環境的治理。春節期間提倡「講文明、講衛生」，這與中共建政初期所提倡的愛國衛生運動有相似之處，但1980年代以來政府卻試圖從社會的各個方面全面進行一次新風新貌的提倡，以此提高公民的素質、打造城市的良好形象。

直到新世紀的今天，春節期間講文明、樹新風，廣泛開展思想道德教育和健康有益的群眾文化體育活動，反對封建迷信，提倡科學健康的生活方式，仍是上海市文明辦重點提倡的內容^⑬。2014年，上海市文明辦發出「平安祥和過大年」市民春節文明公約，號召民眾「移風易俗，革除陋習」，「節日期間少放爆竹、節儉用餐、平安互助、健康娛樂，過一個綠色、文明、祥和的新春佳節」^⑭。在市文明辦的積極推動下，上海有1,965個市級文明小區簽訂公約，響應過文明新年的倡議。此倡議在民眾中間也獲得較大反響，普陀區桃浦鎮紫藤苑小區有居民表示：「市文明辦發出的文明公約真的很好」，「改變民俗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我們已看到一些進步」；長寧區虹儲小區作為全國第一批綠色社區，黨員帶頭不放鞭炮；徐匯區徐匯苑小區自己也制訂文明公約，在居民中深入進行移風易俗^⑮。新年期間政府對文明新風的提倡，同樣是以政變俗的重要內容。在政府的積極引導下，民眾的思想觀念在逐步發生着轉變，現代化的生活方式逐步在上海這座城市確立。

（三）促進經濟增長

按照傳統的春節習俗，作為一個辭舊迎新的時刻，穿新衣、嚐佳餚是春節的重要內容，由此也使春節成為一個消費型的節日。無論是美味的佳餚，還是多樣的禮包，紅火的春節市場助推了假日經濟的發展。對此，有研究者指出：「春節不僅是傳統文化節日，同時也是最能帶動社會消費和促進經濟增長的節日；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過大年』，更是一個拉動市場經濟動力的『新引擎』。」^⑯政府也充分認識到了借助民俗節日，有助於繁榮市場，推動旅遊業的發展。2000年國家旅遊局等發布〈關於進一步發展假日旅遊的若干意見〉，認為假日經濟「有力地拉動了內需，增加了財政收入……繁榮了地方經濟，促進了資源優勢向產業優勢的轉化以及一些地區特色經濟的形成」^⑰。上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發布的〈關於進一步發展上海假日旅遊的若干意見〉則提

出要「把握市場趨勢，引導旅遊消費」⁸⁸。為規範旅遊市場，上海市政府先後頒布《上海市旅行社管理辦法》、《上海市旅遊條例》等法律法規⁸⁹，加強對旅遊市場的監管。與此同時，上海進一步拓展旅遊範圍，除了外灘、歡樂谷等具有現代特色的景點外，還相繼推出了古鎮遊、民俗展等旅遊活動，吸引遊客，展現傳統上海的民俗風情。根據中國旅遊研究院發布的2013年春節黃金周旅遊人氣排行榜顯示，在全國出行及到達兩項人氣城市排名中，上海都穩居第一⁹⁰，可見政府通過民俗繁榮旅遊市場，帶動經濟發展取得成效。

(四) 豐富娛樂文化

1980年代以來，隨着政治對春節習俗影響力的減弱，春節文化市場逐漸繁榮起來。1979年春節，上海電影院的銀幕上除了上映與政治具有一定相關性的《大河奔流》(1978)、《崢嶸歲月》(1978)、《春歌》(1978)等影片，還出現了反映愛情的《桃花扇》(1963)、美國科幻大片《未來世界》(*Futureworld*, 1976)、《車隊》(1978)和香港影片《三笑》(*Convoy*, 1964)等等⁹¹。銀幕上變化，不僅僅在於演出內容的變化，更代表着一個時代的轉變。政府從對春節文化的嚴格控制，轉向繁榮春節文化市場，滿足公眾的娛樂需求，春節再次熱鬧起來。

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上海在春節期間通過圖書、電影、展覽、傳統民俗活動等豐富多彩的文化產品，給春節營造更為濃厚的文化氛圍。上海大劇院、上海音樂廳、上海圖書館、上海大觀園、人民廣場等各公共娛樂場所進行多樣的演出或表演，為市民送上春節文化盛宴。特別是各區縣、單位舉辦的燈會、鬧元宵、民族風情節等等，在政府的財政投入下，旨在讓民眾感受傳統的過年氣氛，回味「老上海」的過年風情。根據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發布的〈春節和元宵節期間上海市群眾文化重點活動〉，2013年春節期間上海舉辦群眾文化活動達1,600餘場次，2014年更是多達1,700餘次⁹²。2014年上海春節和元宵節期間舉辦的重點活動包括市民攝影比賽展、豫園燈會、農民工假日免費電影專場放映、養老院慰問活動、少兒年俗活動等等，不僅內容豐富，而且涉及社會各個群體，讓不同年齡段、不同行業的人員都能感受到過年的氣氛。這些春節娛樂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據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的統計，1995年至今，豫園燈會在每年元宵節當天，遊客量約有35萬人次，最高峰的正月十五晚能達70餘萬人次⁹³。在這些眾多的遊人中，無論是耄耋老人還是垂髫兒童，其廣泛參與反映出政府主導的春節娛樂符合民眾的需求。政府為民眾提供春節娛樂服務的過程，實際也是獲取民眾對政府認可的過程，但這個過程比強行變革習俗更行之有效。

總括而言，1980年代以來的春節，是在祥和的氣氛中度過的。政府對春節習俗的變革由政治導向轉向民俗導向，在尊重民俗變革規律的基礎上，積極引導民眾在春節期間樹新風，展新貌，開展健康文明的生活、娛樂方式。同時，政府也充分利用春節這一大眾化的節日，發展旅遊，舉辦民俗活動，滿足公眾的文化娛樂需求。在這一轉型過程，減少了政治色彩，更多的是民俗向生活的回歸。

五 結語

二十世紀以來，現代國家初創，構建政治權威是實現國家有效統治的關鍵。政治權威的構建，不僅僅在於建立對地方的有效控制，更在於獲取民眾的認可與服從。因此，政府無不把變革民俗視為鞏固統治基礎的重要手段，並依靠政權的力量開展民俗變革。面對國家權力的管控，民俗文化也在暗地裏進行抵抗，但這抵抗是否有效則與國家對地方的控制力密切相關。無論是南京臨時政府還是北洋政府，國家權力都無力強制推行統一的國家文化，因此民國初年有「陰陽合曆，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之說^④。而南京國民政府及之後的中共政權，則是在對地方加強控制的情況下強力推行變俗，試圖在變革民俗的過程中進一步將國家權力深入到地方。尤其是1960年代的革命化春節，國家通過對民俗的控制建立了自上而下的權力網絡，民眾的習俗活動被置於這個網絡中運行，但當時也不乏民眾的抵制。直到文革結束，國家權力從民俗領域退卻，傳統習俗重新回歸社會。

民俗對國家權力的抗爭，在向我們昭示着民俗本身「民」性與「俗」性對國家權力的消解，它能夠依靠民眾的心理認同頑強地生存下來，並對抗國家文化模式的挑戰。隨着革命時代的遠去，國家引導民眾過一個健康、愉快的新年，實際是民俗回歸其本身的演變邏輯。近百年的習俗變革歷史告訴我們，習俗變革是一個長期的、緩慢的過程，需要政府與民眾的不斷溝通與理解；強力推行，逆時而動，無視習俗自身變革的規律，急於求成，其結果是非但不能強化政府權威，反而降低政府公信力。

註釋

- ① 周星：〈導言〉，載周星主編：《國家與民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頁1。
- ② 萬建中：〈民俗的力量與政府權力〉，《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5期，頁78。
- ③ 左玉河：〈評民初曆法上的「二元社會」〉，《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頁222-47；〈從「改正朔」到「廢舊曆」——陽曆及其節日在民國時期的演變〉，《民間文化論壇》，2005年第2期，頁62-68；〈南京國民政府的廢除舊曆運動〉，載《國家與民俗》，頁142-76；李軍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華北根據地春節文娛述評〉，《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2期，頁92-99；薛雲、李軍全：〈論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春節娛樂：1937-1949〉，《抗日戰爭研究》，2012年第1期，頁63-75。
- ④ 熊月之：〈總序〉，載《異質文化交織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頁1、3。
- ⑤ 左玉河：〈南京國民政府的廢除舊曆運動〉，頁142-76。
- ⑥ 〈前言〉，載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1。
- ⑦⑧ 艾萍：〈變俗與變政——上海市民俗變革研究（1927-1937）〉（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7），頁41；44。
- ⑨ 〈舉行大祝典之盛況〉，《申報》，1912年1月16日，第7版。
- ⑩ 〈北京袁總統電〉，《申報》，1912年2月21日，第3版。
- ⑪ 夢幻：〈閑評一〉，《大公報》，1913年1月1日，第1張。

- ⑫ 〈第三旅禁止軍士陰曆年與之文告〉，《申報》，1913年2月1日，第7版。
- ⑬ 半梅：〈舊新年紀事〉，《申報》，1914年2月2日，第13版。
- ⑭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中華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一至六月份》（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82），頁211。
- ⑮ 〈中央宣傳部電告元旦宣傳要點〉，《申報》，1928年12月28日，第13版。
- ⑯ 韓信夫、姜克夫主編：《中華民國史大事記》，第四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2846。
- ⑰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一編，文化（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頁435。
- ⑱ 〈推行國曆新年辦法〉，《申報》，1930年12月24日，第13版。
- ⑲ 〈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民眾訓練委員會為國曆新年休五天，舊曆新年不得休業事通告〉，《民國日報》，1930年12月26日，第2張，第3版。
- ⑳㉑㉒ 〈這三天中〉，《申報》，1931年2月22日，增刊第13版。
- ㉓ 〈厲行國曆聲中革除廢曆消息〉，《申報》，1930年1月25日，第17版。
- ㉔ 〈重申禁止廢曆陋俗〉，《申報》，1931年2月15日，第9版。
- ㉕ 〈昨天〉，《民國日報》，1931年2月18日，第2張，第1版。
- ㉖ 引自伍野春、阮榮：〈民國時期的移風易俗〉，《民俗研究》，2000年第2期，頁62。
- ㉗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439。
- ㉘ 高丙中：〈民間的儀式與國家的在場〉，《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頁43。
- ㉙ 如馬佳對1930與1950年代兩次新年畫運動的研究，分析新年畫運動時如何分別將「民眾」定義為以農民為主體的底層群眾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階級化大眾（馬佳：〈新年畫運動與「民眾」的身份確認問題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楊冬圍繞1958年對《晚會新裝圖》的爭論，認為這是新中國視覺符號系統建立過程中的一個標誌性事件（楊冬：〈圖像隱喻與意識形態修辭——從20世紀50年代月份牌年畫中的女性形象談起〉，《江西社會科學》，2009年第1期，頁231-34）；洪長泰在對1950年代新年畫運動的研究中，則注意到了國家權力在新年畫運動中的應用（Chang-tai Hung, "Repainting China: New Year Prints [Nianhua] and Peasant Resistanc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2, no. 4 [2000]: 770-810)。
- ㉚ 〈關於開展新年畫工作的指示〉，《人民日報》，1949年11月27日，第4版。
- ㉛ 〈文化部、出版總署關於加強年畫工作的指示〉，載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第三冊（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頁371。
- ㉜ Chang-tai Hung, "Repainting China", 801.
- ㉝ 潘世聰：〈我對幾張年畫的意見〉，《文匯報》，1954年1月21日，第8版。
- ㉞㉟ 譚菊人：〈從年畫下鄉上山展覽看年畫創作發行上的問題〉，《文匯報》，1958年4月12日，第2版。
- ㊱ 〈晚會新裝圖〉，上海市檔案館，案卷號B167-1-346-73。
- ㊲ 參見楊冬：〈圖像隱喻與意識形態修辭〉，頁231。
- ㊳ 〈關於年畫「晚會新裝圖」向國外發行處理意見的函〉，上海市檔案館，案卷號B167-1-346-73。
- ㊴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關於加強對上海市私營美術出版業的領導，消除舊年畫及月份牌畫片中的毒害內容的指示〉（1951年9月19日），上海市檔案館，案卷號B172-1-49。
- ㊵ 〈文化部、教育部關於開展年節、春節群眾宣傳工作和文藝工作的指示〉，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辦公廳編：《文化工作文件資料彙編（一）（1949-1959）》（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辦公廳，1982），頁254。
- ㊶ 〈文化部、教育部關於開展春節群眾宣傳工作與文藝工作的指示〉，載《文化工作文件資料彙編（一）（1949-1959）》，頁256-57。

- ④② 上海市文化局：〈新的問題新的嘗試——上海文藝界春節三大遊樂場演出總結〉，上海市檔案館，案卷號B172-1-16-15。
- ④③ 〈戲曲曲藝編導準備春節競賽〉，《文匯報》，1949年12月10日，第3版。
- ④④ 屠岸：〈迎接「戲曲報」的誕生〉，《文匯報》，1950年2月16日，第5版。
- ④⑤ 〈上海市地方戲曲、曲藝改造運動春節演唱競賽條例〉，上海市檔案館，案卷號B172-4-68-10。
- ④⑥ 〈關於開展春節群眾文藝活動的聯合通知〉，上海市檔案館，案卷號C21-1-527-53。
- ④⑦④⑧ 〈上海市文化館一九五五年春節文藝活動總結〉，上海市檔案館，案卷號B172-4-429。
- ④⑨ 關於「革命化春節」口號的由來，作者在力所能及範圍之內依據目前的檔案、報刊查證，發現最早見諸報端為1964年《解放日報》刊登的上海江南造船廠鄭世洪小組的來信：〈倡議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在當時「三大革命運動」（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的影響下，信中寫道：「我們覺得，要過好春節，也有個革命化的問題。」《解放日報》在同版配發了〈以革命的精神過春節〉的社論，明確提出「幫助大家過個充滿社會主義氣氛的、革命化的春節」（參見《解放日報》，1964年2月1日，第1版）。此後，關於「革命化春節」的號召不斷見諸報端和政府文件，如〈熱烈響應倡議，過個革命化春節〉，《新民晚報》，1964年2月2日，第4版；〈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人民日報》，1968年1月20日，第2版；〈關於過一個革命化春節的通知〉，《工人造反報》，1969年2月6日，第4版；〈首都軍民歡度革命化的春節〉，《人民日報》，1969年2月18日，第3版；〈陳行公社狠抓革命化春節的情況匯報〉（1970），閔行區檔案館，案卷號89-2-0593-005，等等。一般來講，提倡過革命化春節分為兩個階段，文革前主要是破除封建迷信，文革爆發後被賦予深刻政治含義，包含對傳統的顛覆。隨着文革結束，此口號逐漸淡出。
- ④⑩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第1版。
- ④⑪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載武漢晚報編：《毛澤東思想萬歲（學習材料）》（武漢，1966），頁9-10。
- ④⑫ 〈倡議書〉，《解放日報》，1967年1月30日，第2版。
- ④⑬ 〈大破春節舊俗，大立毛澤東思想新風〉，《文匯報》，1967年2月9日，第3版。
- ④⑭ 〈中國食品公司上海市禽類蛋品公司一九六七年春節供應工作記要〉，上海市檔案館，案卷號B98-2-55-25。
- ④⑮ 筆者與李阿姨（74歲，原上海柴油機廠工人）的訪談。上海黃浦區其家中，2014年6月22日。
- ④⑯ 吉登斯：〈生活在後傳統社會中〉，載貝克（Ulrich Beck）、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拉什（Scott Lash）著，趙文書譯：《自反性現代化：現代社會秩序中的政治、傳統與美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80。
- ④⑰ 筆者與莫驗（61歲，退休工人）的訪談。上海大學，2013年7月2日。
- ④⑱⑲ 筆者與王美娣（54歲，退休工人）的訪談。上海大學，2013年7月9日。
- ④⑳ 〈中共中央關於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支部生活》，1967年第4期，頁10。
- ④㉑ 〈要節約鬧革命，保護國家財產〉，《人民日報》，1967年1月26日，第1版。
- ④㉒ 〈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文匯報》，1969年2月14日，第3版。
- ④㉓ 〈積極向顧客做宣傳工作〉，《解放日報》，1968年1月21日，第2版。
- ④㉔ 〈過勤儉節約的革命化春節〉，《解放日報》，1969年2月14日，第4版。
- ④㉕ 〈關於春節市場安排和當前市場情況的匯報〉，上海市檔案館，案卷號B123-7-181-8。
- ④㉖ 〈煉鋼爐前過春節，打響新春第一炮〉，《文匯報》，1971年1月28日，第2版。
- ④㉗ 〈春節加油幹，班班都超產〉，《文匯報》，1972年2月19日，第2版。
- ④㉘ 〈國務院發出今年春節不放假的通知〉，《人民日報》，1967年1月30日，第1版。
- ④㉙ 〈黃浦春潮逐浪高〉，《文匯報》，1967年2月10日，第4版。
- ④㉚ 〈國務院關於一九六八年春節放假的通知〉（1968年1月15日），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藏。

- ⑩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業交通組關於部分工廠春節堅持生產創造新成績〉，上海市檔案館，案卷號B246-2-1118-48。
- ⑪ 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閔行區地方志辦公室編：《話說上海 閔行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頁137。
- ⑫ 〈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記錄稿），載湖北日報編：《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內部學習）》（湖北，1967），頁6。
- ⑬ 〈破春節舊俗，立革命新風〉，《解放日報》，1968年1月19日，第4版。
- ⑭ 黃宗智：〈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鬥爭——從土改到文革時期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載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90。
- ⑮ 〈憶苦飯教育深〉，《解放日報》，1969年2月19日，第2版。
- ⑯ 〈28座寺廟敬香首次全安保〉，《解放日報》，2015年2月16日，第6版。
- ⑰ 《上海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中國政府網，www.gov.cn/ztl/content_172778.htm。
- ⑱ 〈八成上海市民表示願棄放煙花爆竹〉，《東方早報》，2014年1月29日，A03版。
- ⑲ 〈振奮精神建設兩個文明，新的一年作出新的貢獻〉，《文匯報》，1982年1月24日，第1版。
- ⑳ 〈集中進行「四提倡四反對」宣傳教育〉，《文匯報》，1982年12月29日，第1版。
- ㉑ 〈上海市一九八五年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要點〉，《解放日報》，1985年2月20日，第2版。
- ㉒ 〈市文明辦發出通知開展文明過春節活動〉，東方新聞，http://news.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148/20010119/class014800006/hwz295228.htm。
- ㉓ 〈「平安祥和過大年」市民春節文明公約〉，《新民晚報》，2014年1月17日，A2版。
- ㉔ 〈上海市文明辦發「春節文明公約」 上千小區簽約〉，中國文明網，www.wenming.cn/syjswmq/zxjyzl/jj/201401/t20140121_1705073.shtml。
- ㉕ 溫源：〈「春節文化」帶動「春節經濟」〉，《光明日報》，2012年1月19日，第16版。
- ㉖ 〈關於進一步發展假日旅遊的若干意見〉（2000年6月14日），中國政府網，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0/content_60257.htm。
- ㉗ 國家旅遊局政策法規司編：《中國旅遊法規全書》（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2003），頁747。
- ㉘ 《上海市旅行社管理辦法》，中國上海網，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3124/node3164/node3171/userobject6ai300.html；《上海市旅遊條例》，中國上海網，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3124/node3164/node3171/userobject6ai1213.html。
- ㉙ 〈上海：春節旅遊人氣最旺城市〉，《東方早報》，2013年2月8日，A07版。
- ㉚ 〈春節銀幕豐富多彩〉，《解放日報》，1979年1月23日，第4版。
- ㉛ 參見〈2013年春節元宵節期間申城群眾文化活動將達1600餘場次〉，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上海市文物局網，http://wgj.sh.gov.cn/wgj/node742/node752/u1ai83612.html；〈申城1700餘場市民文化活動「迎新春 慶元宵」〉，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上海市文物局網，http://wgj.sh.gov.cn/node2/n1716/n1722/n1832/u1ai86972.html。
- ㉜ 〈關於上海市推薦全國「春節文化特色地區」名單的公示〉，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上海市文物局網，http://wgj.sh.gov.cn/wgj/node888/node897/u1ai83373.html。
- ㉝ 引自艾萍：〈變俗與變政〉，頁46。